

# 阴山岩画古车图像与早期草原交通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摘要：**阴山岩画古车图像可以与传说时代“轩辕”故事联系起来分析，有益于说明车辆发明与早期使用推动上古文明进步这一历史过程。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指出，草原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方便。在远古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草原交通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穆天子传》记录周穆王西行路线，经历阴山地方的情形值得注意。断代是岩画考察一大难点。分析阴山岩画古车图像，可以借助考古学经验试推定若干画面的大致年代。对阿尔泰山、贺兰山、卢山、黑山等地岩画的古车图像进行综合考察，显然是必要的。这样的工作，或可能深化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期交通形态的认识。

**关键词：**阴山 岩画 车 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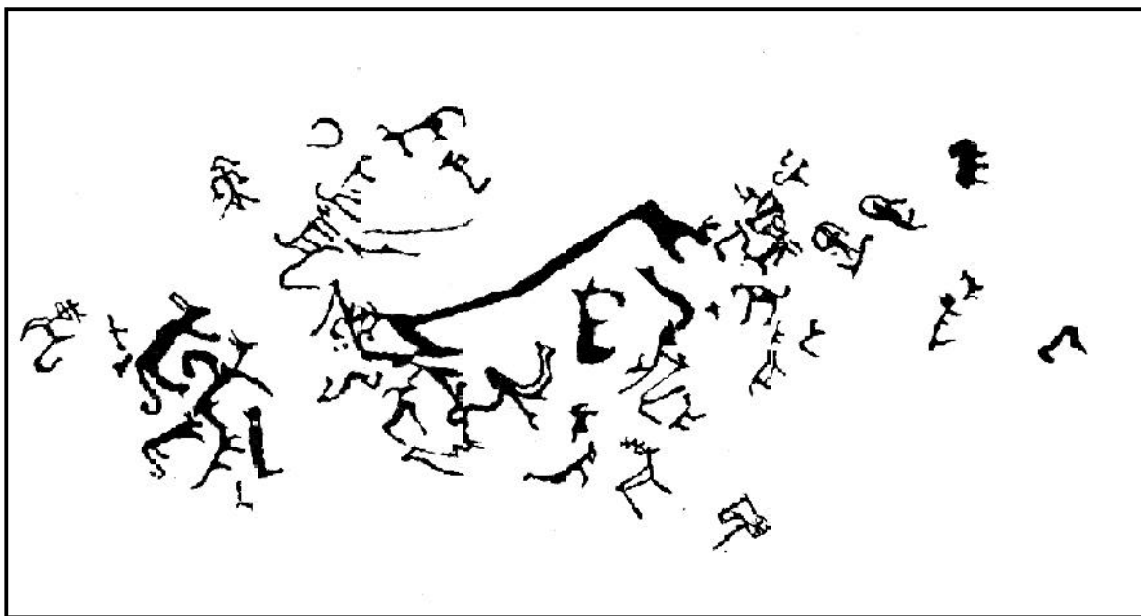


图1

阴山岩画的现有考察资料中，多有反映车辆应用于交通的画面。阴山岩画的古车图像，对于我们认识和说明古代草原交通的形式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察中国交通发展的早期形态，不可以忽略这些信息。

## 阴山岩画所见古车图像

阴山岩画有表现车辆形象的画面。例如：

乌拉特中旗几公海勒斯太及其附近岩画：

(1) 第3地点第2组画面表现射猎场面，又有人物舞蹈形象。画面正中为一群动物。下方有车辆。据盖山林先生记述：“画面下方，有一侧视的毡车图

形，车轮辐条有十五根，车厢上方用竖木棍支撑着毛毡，人坐其内，可避风雨。这个车辆图形，有明显的用金属工具刻划痕迹，与其他岩画相比，不论其作画方法和画风都判然有别。”

(图1)<sup>[1]</sup>

(2) 第4地点第14组，“画面的左方有两个车轮，前方刻画着两个简单的动物，整个画应表示由两匹马曳拉着一辆双轮车。车的辐



图2

条多寡不一，右轮有四根，左轮有八根，看来并不真正代表车辐的真实数字，仅示意而已。”（图2）<sup>[2]</sup>

（3）第17地点第2组，据盖山林先生说，“在巴音乌拉前山沟南山顶长城的南侧，是一幅车辆岩画。车双轮，无辐条，一舆，一轴，单辕。



图3

辕两侧各套一马，右边那匹马的一侧，似另有一匹小马跟着。”（图3）<sup>[3]</sup>

乌拉特中旗韩乌拉山峰一带岩画：

（4）第19地点第5组，“中间有两辆未套牲畜的空车，一前一后排列。前车，有双轮，右轮有七根辐条，左轮有四根辐条，圆舆，双辕，辕前一衡。从画面两轮辐条不一致的情况分析，恐仅是示意而已，故双辕似应为单辕。后车，双轮，每轮五根辐条，方舆，单辕。画面下方，有系尾饰的猎人，正在射击一只动物。”（图4-1，图4-2）<sup>[4]</sup>下方画面是否射猎似乎还可以商榷。车辆旁侧有未系驾的牲畜，是值得注意的。作为牵引动力的牲畜，前车一，后车二。从这一迹象分析，前车应是双辕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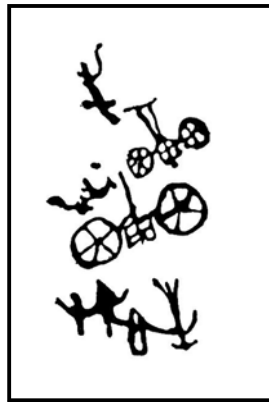


图4-1



图4-2

乌拉特后旗大坝沟一带岩画：

（5）第26地点第15组，据记述，“画面上方像是一辆未完成的车子作品，用琢和磨法做成。中间的左方有一车辆图形，用琢、磨、划三种方法制成，能看见车辕、车轮、车尾、车舆和车篷。车篷大概用毛毡做成，并用木棍支撑起来，画面下部也有一辆车，两者大致相同，只是显得更规整些。车舆后面划着两道直道，不知用意。这种形式的车辆，已接近于现在蒙古草原的牛车，是一种棚车，车棚用毡子裹起来，蒙语叫做哈木特日格，是当地牧民的交通工具。过去蒙古草原上流行一种马拉轿车，也是这个样子，可见流行于蒙古牧区中车的样式是源远流长的。唐代回鹘人有一种毡车，《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胡三省注有‘毡车以毡车为屋。’回鹘人的毡车，大概与这里的毡车样式相似。”（图5）<sup>[5]</sup>今按：《资治通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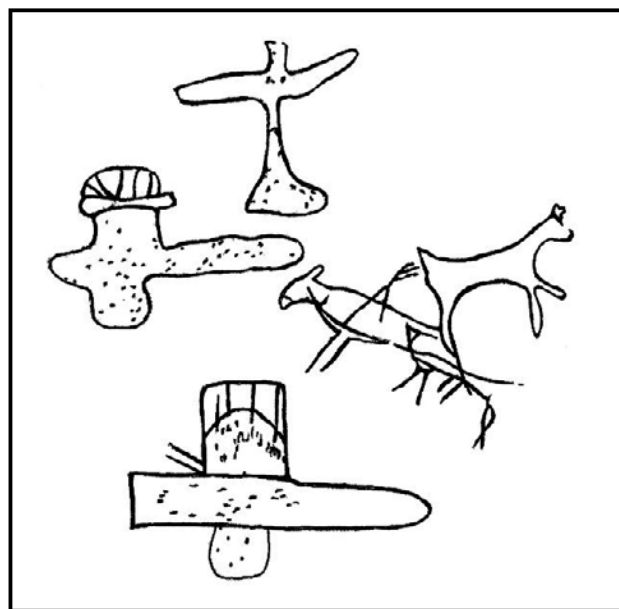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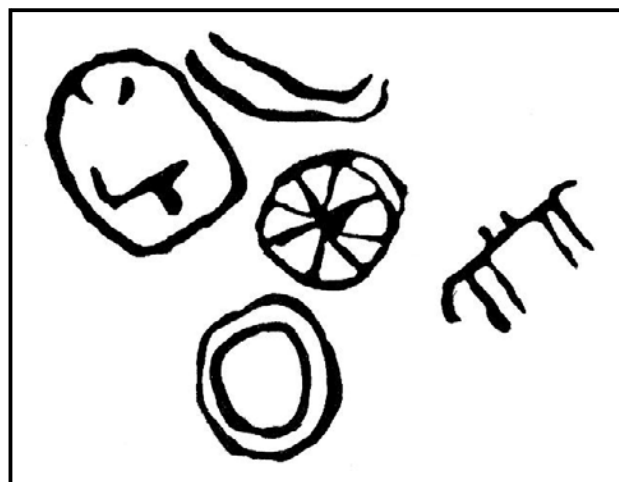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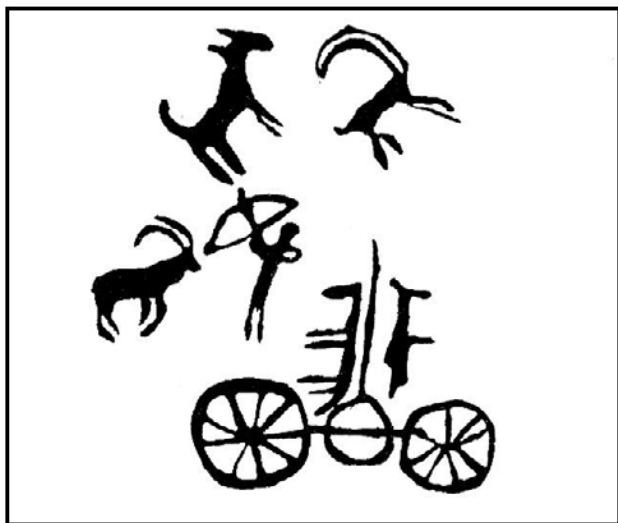


图7-1



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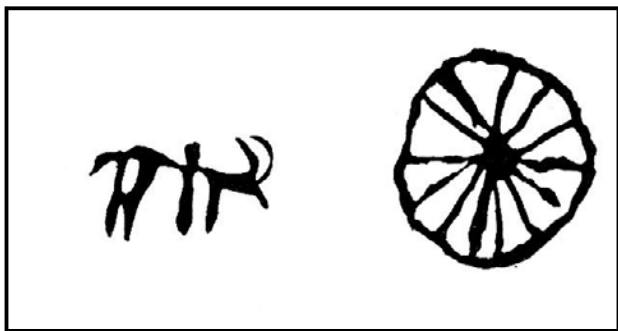


图8

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石）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胡三省注：“毡车，以毡为车屋。”

磴口县和乌拉特后旗交界一带托林沟东段岩画：

（6）第12地点第5组，似为分解的车辆。“左上方可能是一个车厢，右下方有两个车轮。右边可能是一匹拉车的马。”（图6）<sup>[6]</sup>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

则画面所描绘的，应当是一辆双辕车。

（7）第26地点第19组，“下方凿刻了一辆车，车由辕、轮、舆、轴构成，轮辐清楚。两轮轮辐稍有差异，右轮辐条八根，左轮九根。舆作圆形，其前有单辕，辕左、右各有一匹马。左上方有一个身略后倾的猎人，手执长弓。”“马车可能与行猎有关，作为运载猎获物之用。”（图7-1，图7-2）<sup>[7]</sup>

磴口县和乌拉特后旗交界一带阿贵沟岩画：

（8）第5地点第16组，“右边是一个有十三根辐条的车轮，车轮不太圆，辐条粗细不一，排列疏密不匀。这一个车轮大概表示一辆车。”（图8）<sup>[8]</sup>

### 轩辕传说：车辆发明与上古文明的进步

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所谓“轩辕”得名，一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sup>[9]</sup>一说“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sup>[10]</sup>

“轩辕”，其实原义是指高上的车辕。《说文·车部》：“辕，辂也。”“辂，辕也。”“轩，曲辂藩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曲辂而有藩蔽之车也。”“小车谓之辂，大车谓之辕。”“于藩车上必云曲辂者，以辂弯曲而上，而后得言轩。凡轩举之义，引申于此。曲辂所谓轩辕也。”

“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被用来作为后人以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文选》卷一班固《东都赋》写道：“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舟舆”等交通工具的创造，被看作“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的重要条件。交通事业的成就，也被理解为帝业的基础。李善注引《周易》曰：“黄帝、尧、舜氏剡木为舟，剡木为楫。”也将交通工具的发明权归于黄帝等先古圣王。

屈原所作《楚辞·远游》中，可见“轩辕不可攀援兮”句，王逸在注文中也有比较明确的解释：

“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可见，“作舟舆”，“作车服”，很可能是黄帝得名“轩辕氏”的主要原因。

黄帝传说往往与“雷”的神话有关，例如，所谓

“黄帝以雷精起”<sup>[11]</sup>，“轩辕，主雷雨之神也”<sup>[12]</sup>，“轩辕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sup>[13]</sup>等说法，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淮南子·览冥》说，先古圣王“乘雷车”，《淮南子·原道》又说：“雷以为车轮”，雷声，正是宏大车队隆隆轮声的象征。司马相如《上林赋》：“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又张衡《天象赋》：“车府息雷轂之声”，以及《汉书·扬雄传上》和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雷辐”，焦贛《易林》所谓“雷车”等，同样也可以看作例证。<sup>[14]</sup>

关于车的发明，还有一种传说。《淮南子·说山》：“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艺文类聚》卷七一引《淮南子》：“见飞蓬转而为车，以类取之也。”《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淮南子》：“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以类取之也。”《说文·艸部》：“蓬，蒿也。”而所谓“飞蓬”者，似乎与“蒿”无关。《诗·卫风·伯兮》“首如飞蓬”，朱熹集传：“蓬，草名，其华似柳絮，聚而飞，如乱发也。”《诗·召南·采芣》“彼茁者蓬”，陈奂传疏：“蓬，春生，至秋则老而飞蓬。”《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这里所谓“蓬”也不应当是“蒿”，“蒿”是本身就大体可以“自直”的，不必“生麻中”。“飞蓬”可能与蒲公英的成熟果实类似。据《辞海·生物分册》：“【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别称‘黄花地丁’。菊科。多年生草本，……冬末春初抽花茎，顶端生一头状花序舌状花。果实成熟时形似一白色绒球，有毛的果实可随风飞散。本种为我国华东、华北、东北等地极为常见的野生植物。”<sup>[15]</sup>关于其生长地域，或说“广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及西南。”<sup>[16]</sup>

车的发明受到飞蓬逐风旋转的启示，或许暗示着草原生活环境和草原生活经历对于车轮创制的意义。

### 草原交通的历史意义

在远古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草原交通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专门就“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有所讨论。他写道，“在我们开始讨论游牧生活的时候，我们曾注意到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

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说，“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sup>[17]</sup>

草原作为便利往来的交通通道，已经为考古学调查、地理学调查和民族学调查的诸多收获所证实。例如对中国西部康巴草原的民族考古考察，就有相关的学术收获。<sup>[18]</sup>

盖山林先生在分析阴山岩画的画面形式与文化内涵时指出，“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很可能是东西商业贸易的中介者，长途贩运大量的、沉重的货物，不仅需要大群马、驼、牛、驴来担任运输，车辆也是不可缺少的。”<sup>[19]</sup>这样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阴山岩画中车辆画面的意义。

### 穆天子西行路线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由伯夭担任向导，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纁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的事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周穆王西巡行程的终极，按照这部书的记述，大



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经在欧洲中部留下了足迹。穆天子西行所至“旷原之野”，有的学者推定“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更北而欧洲大平原亦在内”。<sup>[20]</sup>

《穆天子传》所记述的内容富有神话色彩，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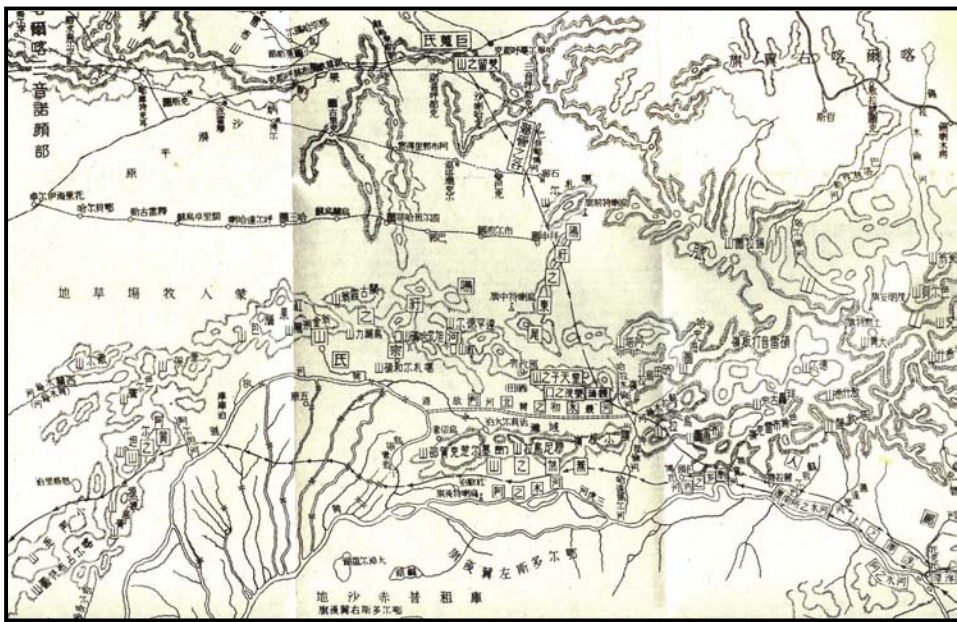


图9

长期蒙被神秘疑云。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所谓《周王传》，应当就是《穆天子传》。可见《穆天子传》一书很早就已经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大业拾遗记》说，隋炀帝时的大型表演“水饰”七十二势中，有所谓“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操津，获玄貉白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三势，都是直接从《穆天子传》取材以为艺术原型的。唐人李商隐的《瑶池》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更为人们所熟知。

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都看作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

虑，《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事迹，在其他史学经典中是有踪迹可察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

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有的学者又认为，把这部书归于“小说家”一类固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如果把它完全看成记录周穆王实际行程的信史，似乎也并不妥当。对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不少学者推定为文化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

阴山岩画考察与研究的先行者盖山林先生指出，“据《穆天子传》

记载，当年穆王自洛阳西巡，是先向北，涉漳水，越钐而至河套以北的蒙古草原。这些事实，暗示了蒙古草原游牧地区可能有一条中西交通的通道。<sup>[21]</sup>在阴山地区和整个蒙古草原上，这一时期车辆岩画发现特多，大约跟这一历史背景有关。”<sup>[22]</sup>这一判断，应当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对于《穆天子传》卷一“戊寅，天子西征，鸷行至于阳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的文句，顾实先生解释说：“阳紆之山，当即绥远乌喇特旗河套北岸诸山之总名。”<sup>[23]</sup>所附《河宗氏图》，指示了穆天子经行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的路线（图9）。

### 若干阴山“车辆岩画”的年代推定

我们注意到，前引（3）所见“车辆岩画”，“在巴音乌拉前山沟南山顶长城的南侧”。（4）所见车辆画面所在的地点，“位于离庙沟水库东北约

3公里的布日格斯太沟南畔三个山头上。布日格斯太沟是韩沟的东支沟，秦汉长城适在这里通过。”<sup>[24]</sup>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为辅助结构。自春秋晚期起，车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走向衰落，但在秦汉之际，兵车在战争中仍发挥一定的作用。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表现为以兵车为主，步骑为辅的形式。秦末及汉匈战争中仍有车战。《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起义军攻陈时，有车六七百乘，周文至关，有车千乘。《史记·孝文本纪》说，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边为寇，文帝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往击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与匈奴战塞北，曾“令武刚车自环为营”。<sup>[25]</sup>李陵困于匈奴围中，也曾经“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sup>[26]</sup>秦汉之际，长城沿线巡边防卫以及出击，都当有兵车队列，大队兵车的通行必然要求交通道路的平整和畅通。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由北边道连贯为一体。史书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派员沿这条道路巡行北部边防的记载。史籍中关于秦汉时代北边道路通行状况的最明确的说明，莫过于关于帝王亲自循北边巡行的记载。北边道的主体部分与长城并行，其干线应是连接北边各郡郡治和主要县治的大道。北边道交通体系的具体结构，又包括城上道路、类似于“环涂”的傍城道路、出塞道路和交通内地的道路等。<sup>[27]</sup>

表现车辆画面的岩画恰好在秦汉长城附近发现，使人们自然会产生这些文化遗存可能与长城

交通有关的猜想。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出土了在交通史上意义重大的双辕车的模型。BM103出土两件牛车模型，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朽痕。<sup>[28]</sup>这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sup>[29]</sup>阴山岩画所见反映双辕车的画面，如（4）的“前车”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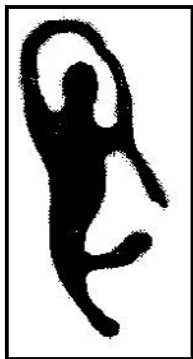


图10



图11-1



图11-2



图11-3



图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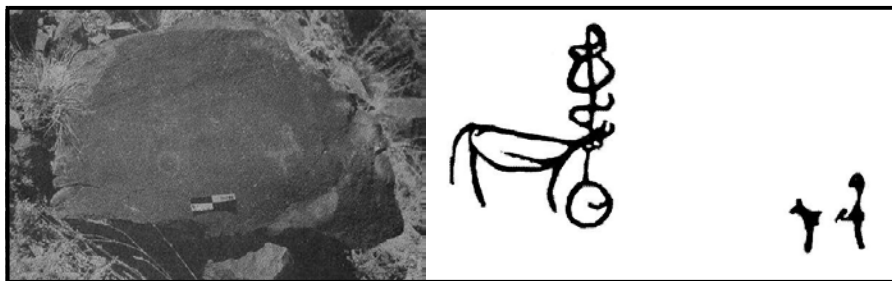


图12

（6）。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些画面的制作，应当是在双辕车的发明之后，也就是战国时期以后，很可能是在秦汉时期。

前引岩画资料（1）车辆形象的上方，据说“有一舞者”，“正作热情洋溢的舞蹈动作。”其实，画面中另外还有两个人物。据盖山林先生描述，“画面右上方，有两个立人，手中似持长尾，绕头而过。”

<sup>[30]</sup>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两个人物也在舞蹈表演之中。特别是右边一位（图10），对照北京大葆台2号汉墓（图11-1）<sup>[31]</sup>、西安三桥镇汉墓（图11-2）





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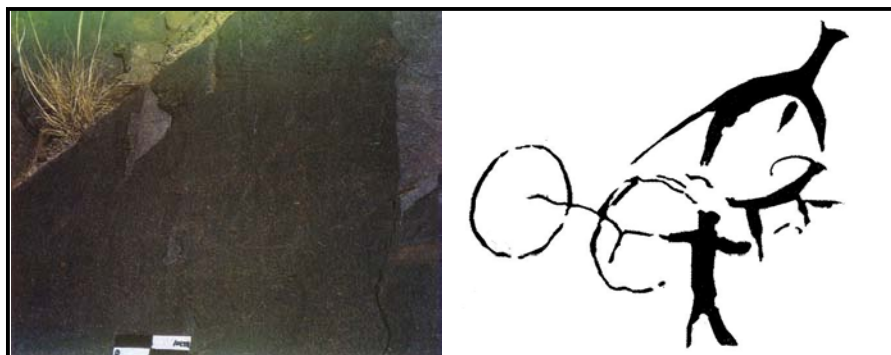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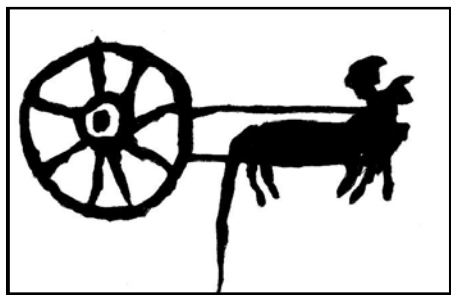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32]、河南永城僖山汉墓(图11-3)[33]、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图11-4)[34]出土玉舞人等资料[35],可以看到其姿势动作和汉代舞女演出的程式化动作十分相像。如果这一人物与车辆同时刻画,则可以参考汉代相关发现推测车辆画面的年代。分析这一情形,当然要考虑到汉地人口包括汉家女子流入草原的情形。[36]

###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岩画 古车图像的综合考察

阿尔泰山岩画有所谓“息车图”(图12)、“车辆图”(图13)、“高车图”(图14)。研究者认为后者“应是高车部族的文化遗存”。[37]

贺兰山岩画也有“马拉车”画面(图15、图16、图17)。[38]车辆的表现方式,有时“用车轮代表车辆”,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种透视的表现方法”。[39]

青海天峻江河乡卢山岩画也有“马拉车”图像(图18)。有一幅画面,有的研究者理解为“一辆三马共驾双轮单辕车”(图19)。[40]汤惠生先生等则将卢山岩画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英雄与野兽”的浮雕艺术比较,以为其车猎场景“完全是狩猎巫术的仪式行为”。又作出了“车的文化属性肯定不是羌或吐蕃人,而是一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判断。[41]这样的结论要说服一般读者,可能还需要更充备的论说以及其他旁证。但是这种研究思路,确实可以给予岩画学的进步提供某种新鲜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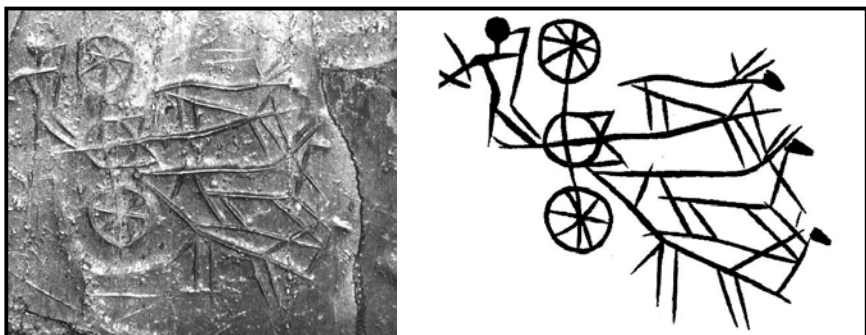


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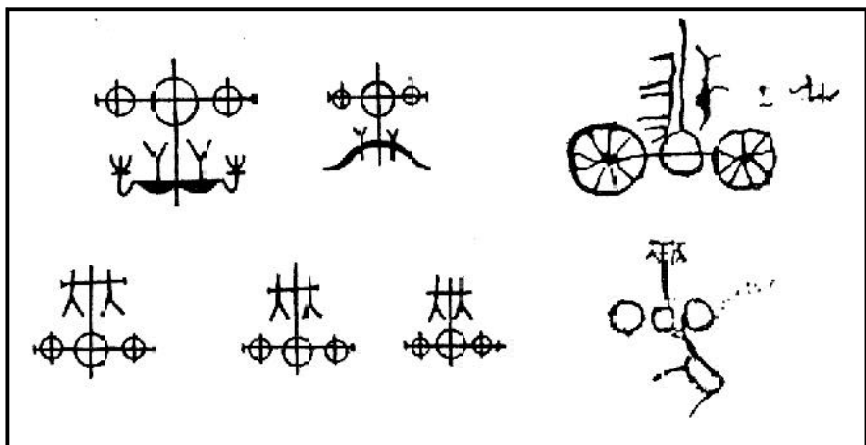


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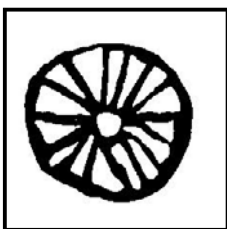


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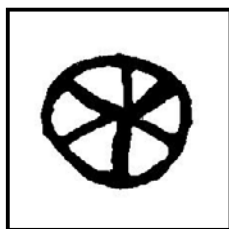


图22

汤惠生先生论著中引录的甘肃黑山岩画的车马画面，用以同金文“车”字的结构进行比较（图20）。论者指出“仅用车轮来象征”车的情形。这种表现方式，也许同有时“用车轮代表车辆”的方式有相近之处。除了前引阿贵沟岩画（8）以外，“用车轮代表车辆”的还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东南边缘的曼德拉山岩画。第1处第102组“是一个车轮，有辐条15根”（图21）。<sup>[42]</sup>阿拉善右旗夏拉玛山岩画的第7组，也是一个车轮，“有6根辐条”（图22）。<sup>[43]</sup>

汤惠生先生引录的这样的意见也值得我们注意：“北方草原的匈奴人是使用车较早的民族之一，在中

亚草原和蒙古草原，匈奴人的车最早发现于岩画之上，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之间。”<sup>[44]</sup>这一结论中，族属的判定和年代的判定，都还可以讨论。至少在一般人的民族史知识中，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时“匈奴人”是否已经出现还是一个问題。但是草原民族的车“最早发现于岩画之上”的意见，也许是可以成立的。

现在看来，进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岩画古车图像的综合考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而真正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获得，也许尚需要多学科学者共同的艰苦努力。

注释：

[1] 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页，第14页图19，题“舞者、狩猎、车辆”。

[2]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29页，第30页图70，题“车辆”。

[3]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66页，第69页图227，题“双马车”。

[4]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123页，第124页图485，题“车辆和狩猎”，图版二一—2，题“车辆”。

[5]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178页，第179页图712，题“车辆和山羊”。

[6]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253页，第255页图1027，题“车轮”。

[7]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269页，第273页图1096，题“车辆和狩猎”，图版四二—2，题“车辆和狩猎”。

[8]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282页，第283页图1143，题“车轮和北山羊”。

[9] 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

[10]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邹诞生音云：‘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

[11] 《艺文类聚》卷二引《河图帝纪通》。

[12] 《太平御览》卷五引《春秋合诚图》。





- [13] 《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张守节《正义》：“轩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
- [14] 王子今：《轩辕传说与早期交通的发展》，《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炎黄春秋增刊，2001年9月），收入《黄陵文典·黄帝研究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
- [15] 《辞海·生物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5年12月版，第334页至第335页。
- [16] 高明乾主编：《植物古汉名图考》，大象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95页。
- [17]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版，上册第234页至第235页。1972年版《历史研究》缩略本对于草原和海洋对于交通的作用是这样表述的：“草原的表面与海洋的表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类只能以朝圣者或暂居者的身份才能接近它们。除了海岛和绿洲，它们那广袤的空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可供其歇息、落脚和定居的场所。二者都为旅行和运输明显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这是地球上那些有利于人类社会永久居住的地区所不及的。”“在草原上逐水草为生的牧民和在海洋里搜寻鱼群的船民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在去大洋彼岸交换产品的商船队和到草原那一边交换产品的骆驼商队之间也具有类似这之点。”《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3页。
- [18] 王子今：《康巴民族考古与交通史的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5日；王子今、王遂川：《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四川文物》2006年3期；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收入《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天地出版社2008年1月版，《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4卷，巴蜀书社2008年3月版。
- [19]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382页。
- [20]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8月版，第174页。
- [21] 原注：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16页。
- [22]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382页。
- [23]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第21页。
- [24]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121页。
- [25]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 [26] 《汉书·李广传》。
- [27] 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6期。
- [28]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29]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页。
- [30]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12页。
- [31]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71页，图六九，图版七四—1。
- [32] 刘云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陕西》，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46页。
- [33] 田凯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28页。
- [34]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
- [35] 白云翔：《从北京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8年5月。
- [36] 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南都学坛》2008年2期。
-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文化处文管所编：《中国阿尔泰山岩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1页。
- [38] 许成、卫忠：《贺兰山岩画拓本萃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 [39] 许成、卫忠：《贺兰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页。
- [40] 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岩画》，文物出版社1993年5月版，图110图版说明（孙宝旗）。
- [41] 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91页至第95页。
- [42] 盖山林：《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2页，第图102。
- [43] 盖山林：《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第59页，第图1112。
- [44] 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第92页。原注：Littauer, M. Rock Carvings of Chariots in Transcaucasia of Upper Palaeolithic Image: Theory Versus Contextual Analysis, Rock Art Research, 1989: No. 1.